

中国，中国！

——共和国外交风云录

陶跃庆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中国，中国！——共和国外交风云录

作 者：陶跃庆

出 版 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ISBN：7-80647-134-0/I253.1

定 价：14.00元

序 言

阎学通

从事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已经多年,但这还是头一次为一本报告文学性的有关中国外交的著作写序。当《中国,中国!——共和国外交风云录》的书稿拿到手后,我真不知读后的感觉会是什么样。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新中国外交的通俗读物出版了很多,其中不乏粗糙攒制的伪劣之作,由此还发生了一些因抄袭而对簿公堂的事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翻开了这部书稿,然而,随着书中情节的深入发展,这种心情渐渐地消失了。

陶跃庆、谷雨、王波勇和王昶四位青年学者,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新中国五十年来既艰苦卓绝又灿烂辉煌的外交历程。作者们在把握了新中国外交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于历史事件进行了故事性的介绍。他们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外交历史事件为依托,对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腻的描述。由于采取了与历史著作和政论性著作完全不同的笔法,因此该书十分引人入胜。

作者们还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评论,陈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很有启迪性。例如,在评论50年代中苏军事同盟破裂这一历史事件时,他们比较了90年代中俄建立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比较使读者能充分地体会两种不同战略合作的区别,以及中国外交是如何从经验不

足走向成熟的。该书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意阻碍中国统一的做法也进行了透彻分析,而且对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分裂中国的策略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中美关系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中美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作者们抓住了这一主线,对五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但相对而言,对中国外交的其他方面着墨显得略少了一点,给人一种主线清晰但全景不足的遗憾。该书是报告文学,因此也难以与历史或政论著作在史实考证和逻辑分析方面相比较。

在90年代初,我曾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的前言中抱怨,我国学者对中国自己的外交研究得太少,没有多少著作可满足读者需要。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中国外交这块园地,实在是使人感到欣慰。《中国,中国!——共和国外交风云录》的出版将为这块园地再添一株新绿。

目录

1	序 言
1	第一章 另起炉灶开基业
19	第二章 睡狮渐已醒
51	第三章 劫波渡尽历峥嵘
68	第四章 柳暗花明入新天
79	第五章 中美关系续新章
104	第六章 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主题
128	第七章 “一国两制”开先河
152	第八章 阴霾渐散现坦途
187	第九章 风云突起两岸间
202	第十章 化干戈为玉帛
216	第十一章 百年之梦一夕圆
233	第十二章 世纪性的访问
262	第十三章 伙伴关系谱新篇
272	第十四章 坚持正义反霸权

第一章 另起炉灶开基业

龙虎会京华

1949年11月,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满月,她虽然还有些稚嫩,但却处处显示出与前辈不同的气质;她虽然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但在这一个月中,她已经让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人民充分体味到了翻身作主人的幸福!再也没有了洋大人们的颐指气使,再也没有了官老爷的作威作福,再也没有了恶霸地主的敲骨吸髓,再也没有了地痞流氓的寻衅滋事。人民终于能够昂首挺胸,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低眉顺目了;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忍气吞声了。因为他们已经砸开了身上的枷锁,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终于可以喊出旧社会一百多年、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想喊又喊不出的声音:“这是我们的中国!”

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了,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有利于国家的事,新中国都会义无反顾、排除万

难去完成！

人民依然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主席于天安门城楼上对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在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为什么中国人民自己的外交部还没有成立？人们在焦急地企盼。

人民急切地盼望自己的外交机构诞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建国伊始这个万端待举、百废待兴的时候，要在短短一个月中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外交机构又谈何容易呵！

在这一个月中，当大家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时，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却几乎总是彻夜通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就在西花厅内。西花厅在中南海众多气势恢宏的建筑中并不惹人注目，也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之后，它已经显出了几分破旧。

西花厅起初是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的官邸。1912年清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黯然退位、移居故宫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盘踞在这里。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登基称帝，成为千夫所指的民贼，在全国人民的斥骂声中死去。此后，北洋政府的军阀段祺瑞又到西花厅办公。而现在，西花厅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西花厅的正房是会客室兼会议室，东西厢房是周恩来夫妇的卧室和秘书们的办公室，再往后的三间北房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

人们总认为总理办公室会陈设着各色各样的现代化设备，其实周总理的办公室非常简朴。最醒目的陈设就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是几个装满图书的书柜，在屋子的另一边是一个用三张桌

子拼成的长条会议桌,还有几把普通的木椅子。

正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周总理按照毛主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战略,仔细地考虑如何洗刷旧中国外交的屈辱,废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如何与世界各国开展交往,确立新型的外交关系;如何组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部,建立一支既熟悉外交业务,又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既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能体现中国人民风采的“文装的解放军”队伍。

现在,总的外交政策、全面的外交方针都已经确立了,与外国建交的原则也基本确定下来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组建自己的外交队伍,成立自己的外交部。

中央已经决定,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同志兼任,这个人选是毛主席亲自提议的,也是中央各位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众望所归。

副部长人选是经周总理提议,由中央研究批准的。他们是:

中共元老王稼祥同志。他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合作共事,后来又一起成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红军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同志办事谨慎小心,为人忠厚公正,与周恩来的合作十分默契。他已经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主要负责开展对苏工作。

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同志。李克农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早在红军时期就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三杰”之一。他曾指挥和参与过保卫上海党中央、联络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策反西南军阀、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等重大任务,他对国际形势十分了解,也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

上海外事处主任章汉夫同志。他也曾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对于外交业务十分熟悉,也是三位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建部之后,许多具体业务将要由他来负责开展。

四位主要领导已经确定下来,接下来就是要从全国抽调优秀

人才来京组成外交队伍了。

周总理考虑,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巩固和发展,这就需要争取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环境,要建立和发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联合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好战分子。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打破旧外交的狭隘观念,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外交活动;不但要有官方外交,还可以有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外交不但要涉及政治领域,还要在经济、文教、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展开。

这种全新的外交要求外交队伍中要汇集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因此,新中国的外交人员不能简单地由旧中国外交人员转换过来,而要另起炉灶,从五湖四海选拔,从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上选拔,要让各地各方面的有志、有才之士来个龙虎会京华!

总理纵览全局,经过仔细权衡,最终决定从四个方面选调外交人才:

一方面是建国以前就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原中央外事组的干部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干部。他们一般都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尤其是中央外事组,它成立于1947年5月1日,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翻译、新闻三处。当初成立这个小组就是因为周总理担心这批从事过外事工作、有一定外事经验,又懂外语的干部散了,将来不好找,因此就指示成立这个机构把这批人才保留下来,以备将来全国解放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

现在,周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终于产生了作用,这个小组的成员在转入外交部后立即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

这第一类干部中人才济济,后来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黄华、钱其琛,以及著名外交家王炳南、宦乡、柯柏年、龚普生、龚澎、章汉夫、章文晋、徐永瑛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第二方面的人才是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

骨干。这些人中有一些已经是军队兵团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干部。他们包括：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飏，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五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军，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大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铨等，这些人后来都陆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

另外，中组部还从全国六十几个军中各抽调了一名师级和两名团级干部，共计一百八十多人，限期到北京报到。建国初期我国驻外使节及使馆主要骨干多由他们担任。

后来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韩叙、余湛、朱启桢，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李清泉、宋之光、康矛召、凌青等也都属于这批选调的人员。

这批干部经受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有着党务、政务和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他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充分运用到外交斗争的实践当中，并把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外交队伍中来。

第三方面的人才是从各文科大学选来的毕业生，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经过了严格的审查，有热情，懂外文，还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他们为外交部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第四方面的人才是起义的旧中国外交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外交部中担任专家或顾问。他们中有著名专家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以及原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梅汝璈等。

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来京，汇成了一股开创新中国外交的滚滚热流。

这些人员来京之后，分别住在新华饭店、解放饭店、方家胡同

五号等处。他们先到中组部报到,中组部再把他们介绍到外交部,外交部人事处又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这些审查报告都须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然后才能正式任用。

当时,许多热血青年都想参加到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中来,后来成为香港《明报》主编、著名武侠小说作家的查良镛(金庸)也在此列。他找到时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参与组建外交部的乔冠华。不料由于他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复杂,又不是党员,乔冠华只好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先去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再考虑入部。但这与金庸不羁的性格相左,于是他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京赴港而去。没能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外交官,成了金庸平生的一大憾事。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基本形成,所需的干部也陆续到齐了。

1949年11月3日下午1点,周恩来召集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等开会,研究有关外交部组织机构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

这是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外交部由苏东司、亚洲司、欧非司、美澳司、国际司、情报司及条约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组成。司下直接设科。当时没有处一级,但是作为外交部中枢的办公厅设了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等五个处。

会议还决定于11月8日正式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奠基展鸿图

从车水马龙的长安街拐进繁华的东单大街,前进约五百米,右边就有一条僻静的小巷——外交部街。沿着这条行人稀少的巷子

前行不远,路北就会出现一座庞大的土灰色的西洋式建筑。与如今现代化的大楼相比,它不免显出几分苍老和寒酸,可是它曾经有过一段辉煌过去。

这座建筑是清政府为迎接德皇威廉二世访华而建的。它的设计是美国人主持的,施工是英国人完成的。

清政府的外交部门——总理衙门曾经由东堂子胡同搬到这里办公。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时,其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里顿时门庭冷落车马稀,逐渐为人们所忘却。直到北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新中国的外交部选在这里办公,这座古老的建筑才重新焕发生机。

1949年11月8日晚七点多,周总理离开西花厅,驱车来到外交部街31号外交部大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在灰楼门口迎接。

三人在办公室商谈片刻后,八点整来到二楼会议大厅。

外交部的全体同志都等候在大厅里,见周总理进来,大家一齐起立鼓掌。总理见礼堂里坐了很多,也十分高兴,就问王炳南:“外交部有这么多人了?”王炳南答:“大概有二百人吧。”

实际上当天到会的是一百七十多人,正是这一百多人撑起了新中国的外交,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贯彻了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外交任务,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当我们回想起这段历史时,不能忘记他们筚路蓝缕的创业之功。

总理环顾了一下会场,发现会场的布置很特别:中间是几张桌子,大家都围坐在桌子四周,领导坐在桌子前面,没有气势逼人的主席台和领导席,领导和群众靠得很近,气氛非常亲切。他点头微笑,对这种布置十分满意。

坐定之后,王炳南逐一为总理介绍了外交部科级以上干部。总理微笑地听着,并不时与被介绍的同志说几句话,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

介绍完毕,王炳南宣布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历史将记住这一刻,因为历经了百年沧桑、如今翻身作主人的中国人民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队伍,新中国外交从此开始书写她那绚丽的篇章!

王炳南宣布请周部长讲话。

周恩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把在座的人都逗乐了:“每一个机关都要开一个成立会,我们也不例外,这也算是形式主义吧。”

但他接着严肃地说:“我们开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与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外交部成立以后,我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一方面感到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

接下来,周恩来为大家阐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他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讲完任务后,周恩来又谈到对外交往的艺术:“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对立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周恩来着重阐释了毛主席制定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谈到了对帝国主义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他说:“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

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回顾起旧中国的外交,周恩来略带激动地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针对有些人办外交时意气用事的情况,如解放南京的解放军冲进美国大使官邸搜查司徒雷登的房间,华北人民政府外事处的一位同志强令前来办事的美国前武官包瑞德写下对我方的反美宣传画的意见等例子,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搞外交‘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外交工作被人家抓住了弱点,便要被打回来。”

最后,周恩来又谆谆告诫外交人员要多分析,勤思考,讲团结,守纪律。他总结说:“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要有纪律。外交同军队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都是一样的。”

周总理的一番话深入浅出,照顾全面又切中肯綮,为新中国外交官上了一堂很好的启蒙课,使到场的同志深受教益。

讲话结束后,周恩来正式宣布了外交部领导成员名单:

部长	周恩来(兼)
副部长	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
苏东司司长	伍修权
亚洲司司长	夏 衍(后由陈家康代理)

欧非司司长	宦 乡
美澳司司长	柯柏年
国际司司长	董越千
情报司司长	龚 澎
条约委员会主任	章汉夫(兼)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兼)
交际处处长	王倬如

会议结束后,人们笑语盈盈地散去,立即投入了各自的工作中。从此新中国的外交部正式开始工作,新中国开始了独立自主办外交的新征程。

尽洗铅华展新颜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建国公告之后,周恩来外长即按照外交惯例向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发出了公函,通过他们将新中国的建国公告送达其本国政府。

10月1日开国大典刚结束,位于东交民巷玉河桥的中央外事组办公楼就一片繁忙,大家准备好了数十封公函,只待周恩来外长亲自签署,以在建国的当天发出。

大典刚散,街上人头攒动,总理能不能按时赶到?大家的心不禁都悬了起来。

这时,几辆小汽车拐进了大门,周恩来健步下车,走进了王炳南的办公室,他带上王炳南回到北京饭店的临时办公室里。

周总理仔细地审阅了这份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

阁下:

逕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

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签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于北京

确定无误后,周恩来在公函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时已是晚上9点。王炳南匆匆赶回外事组,把懂外文的同志召集起来,分头发送外交部001号公函。

一个小时内,在北京的苏、美、英、法、荷、比、意七国原领事就收到了这份公函。留在南京的缅、印等十二国的原外交代表在10月2日即接到我南京市外事处主任黄华送交的公函,但由于当时街上正举行庆祝游行,使团人员无法到达,于是约见改在10月3日上午。

同日,上海市外事处章汉夫主任也向在上海的原各国领事送交了公函。

这两天中,北京、南京、上海三地的电报局十分繁忙,各国领事迅速将公函的内容电告本国政府。

一石激起千层浪,世界各国纷纷对这份公函作出了反应。

10月2日晚9点,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宣布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原驻广州的大使。

10月3日,周恩来复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7日,原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戈宝权以中国驻苏使馆临

时代办的身份接收了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 13 号的原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这个使馆是 1934 年设立的,其馆舍是当年苏联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一幢 18 世纪的别墅式建筑,现在这个建筑连同原国民政府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十二个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一起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率先承认新中国的行动立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纷纷致电承认新中国。

这可忙坏了新中国的外交官们,大家在处理国家间事务上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更加急人的是有些小语种大家都不懂,这给工作增加了困难。在收到波兰副外长莱西斯基打来的电报后,起草回电时,大家都不知道应如何把这个名字翻成波兰文,找到几个去过波兰的同志,也是语焉不详,电报就要发了,可抬头姓名就是填不上,急得大家抓耳挠腮,最后费了一番周折终于译出了这个名字,及时地发出了回电。

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的也表达了愿意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缅甸政府最先承认新中国,印度和英国紧随其后。截至 1950 年 4 月,共有十五个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鉴于这些国家中许多没有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新中国决定不依照国际惯例相互致电承认、建交,而实行谈判建交。

在谈判中,我方要求对方满足三个建交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先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

第二、要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第三、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对方答应了这三个条件之后,双方再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以建立邦交。